

秋瑾生平史料辨伪

郭延礼

一、秋瑾入同盟会时间考

秋瑾参加同盟会在一九〇五年同盟会建立不久，这已无疑问；但具体在何时，说法有分歧。冯自由说在是年夏历七月，但不少记载作夏历八月（阳历九月）^①。

关于秋瑾入同盟会时间，一般据冯自由《鉴湖女侠秋瑾》中的记载：“乙巳七月东京同盟会本部成立后半月，冯自由介绍秋瑾至黄克强宅入党。”既然如此，为什么在具体时间上产生分歧呢？关键在于冯氏所云“东京同盟会本部成立后半月”一句？此处所谓“同盟会本部成立”是指哪一次会议？毛注青、郑云山^②、敬莺等同志说是指夏历七月二十日（八月二十日）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；但据我考查冯自由有关此事的三处记载^③，冯氏所指是六月二十八日（七月三十日）中国同盟会筹备会。这次会议到会者七十余人，均由孙中山率领宣誓加盟，成为中国同盟会第一批会员。就此意义上，有人称它为同盟会第一次会议^④或第一次成立会。冯自由：《中国同盟会史略》称六月二十八日会议为“同盟会第一次开会”，称七月二十日会议为“同盟会之第二次成立会”。据此我认为“东京同盟会本部成立后半月”，此处“后半月”，是由夏历六月二十八日同盟会第一次会议算起。何以见得呢？

一、冯自由《光复会》云：“秋瑾于乙巳七月由冯自由介绍

入同盟会。”他的《鉴湖女侠秋瑾》，《丁未浙江光复军倡议实录》所记与此处文字上虽稍异，但秋瑾入会时间在“七月”这点尽同。同盟会第一次会议是在夏历六月二十八日，“后半月”，即在七月十三、四日。冯氏是秋瑾入同盟会的介绍人，他的记载我以为可信。

二、秋瑾当时在留日学生中很活跃，据陶成章说：“秋瑾者，素热心于办事，凡开会时，彼如有可到会之资格者，无不到；凡革命党秘密会之有可入者，亦无不入。”^⑤按秋瑾是当时留日女生中佼佼者，她当然是有“到会”和“参加”同盟会之资格的，更何况同盟会既是兴中会，华兴会，光复会等革命组织的联合，秋瑾当时已是光复会会员，当然有资格参加六月二十八日的会议。那末她为什么未参加同盟会第一次成立会并成为首批同盟会会员呢？答曰：秋瑾当时生病。

秋瑾二次抵东京是一九〇五年六月二十一日，这次东渡她乘三等舱，适值盛暑，加以途中颠簸，她病了一场，这点吴芝瑛《记秋女侠遗事》、陶成章《秋瑾传》均有记载，故六月二十八日同盟会第一次会议秋瑾因病未能参加。

夏历七月初，秋瑾病愈，初五入青山实践女校附设师范班学习。十三日，留日学生在东京麹町区富士见楼举行盛大集会欢迎孙中山莅日，到会者一千三百余人，座无虚席，秋瑾也参加。次日，七月十四日，也就是冯自由所谓“同盟会本部成立后半月”，秋瑾由冯氏介绍在黄兴寓所入会。于此，李新、孙思白主编《民国人物传（一）·秋瑾》云：“她到东京后，经黄兴介绍见到孙中山，随即加入同盟会。”秋瑾首次与孙中山会见为夏历七月十三日，“随即”加入同盟会，当为同日或次日。《民国人物传》所记秋瑾参加同盟会时间似与我见相同，惜乎无具体日期，难以为据。

秋瑾参加同盟会时间，两种意见虽系夏历七月与八月之差，

但此有关先烈参加重要政治党派的具体日期，是不能随便一书的。

二、秋瑾归国后曾否回过湘潭及时间考

秋瑾二次归国到就义，主要是从事革命实践活动。据考查，这中间她曾回湘潭一次，主要目的在为光复军起义筹措军饷，当然也兼有回去看看孩子的意思。

对于这点，许多秋瑾传记史料，包括陶成章《秋瑾传》、吴芝瑛《秋瑾女侠传》、徐自华《鉴湖女侠秋君墓表》、陈去病《鉴湖女侠秋瑾传》、冯自由《鉴湖女侠秋瑾》、徐双韵《记秋瑾》、谢猷《秋瑾年谱》、李新、孙思白主编《民国人物传（一）·秋瑾》、孙元超《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·秋瑾年谱》均只字未提，究竟有无此事呢？仍是一个疑点。

最先记载此事者为瑾弟秋宗章，他在《六六私乘补遗》中说：“迨光复会（按应为“光复军”）组织成立，筹饷购械，难以为继，……先大姊目击心伤……专赴湘潭，孑身至王宅，时子芳宦京未返，君舅健在，谈及悉姊近况，即畀数千金。”又王时泽《回忆秋瑾》云：“就在这年（一九〇七年）春天，秋瑾回到湘潭王家视其子女”，又说：“她这次去湘潭，往返经过长沙，都住在我家（长沙通泰街忠信园），我的六岁侄女孟明，看见她穿的长袍马褂，一派男装，称之为‘秋伯伯’。”^⑥王氏可谓言之凿凿。李佐棠《秋瑾在湖南》亦说：一九〇七年春，秋瑾回株洲（按今株洲县系由原湘潭县析置）看她的儿女，几天后就回浙江了，这是她与湖南的最后一别。”^⑦

查《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·蒋继云供》，亦谈到秋瑾让蒋继云同去湖南劝捐事，蒋氏未去。据蒋氏云：是秋瑾与竺绍康同去的。蒋继云系叛徒，所言不尽可靠，但秋瑾曾去湖南劝捐事当大体有之，复验证以上瑾弟宗章、瑾友王时泽之记述，我认定瑾返国后确去过湘潭。

秋瑾去湘潭在何时呢？说法也有不同。

谭日峰《湘乡史地常识》^⑧一书“先烈秋瑾”条云：“（瑾）从日本归国后，向（王）黻丞索银二千两，办大通学堂，曾一度回神冲故里”，亦有此说，惟具体时间语焉不详。郑云山《秋瑾》，据谭氏“自日本归国后……办大通学堂”云云，推定秋瑾赴湘潭在一九〇六年秋冬之间，并云：“当时从浙江到湘南尚无铁路，秋瑾又在筹办了《中国女报》之后就立即全力以赴地忙于组织光复军，往返奔波于浙江各地，（一九〇七年）不可能远道去湖南。”^⑨郑云山同志不同意秋宗章、王时泽一九〇七年春瑾赴湘潭之说，但他并未提出有力的反证。至于因“尚无铁路”和忙于“奔波于浙江各地”便“不可能远道去湖南”云云，只不过是推测之词，难以令人确信，此其一；另据《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·蒋继云供》云：秋瑾与蒋继云相识在一九〇七年，那末，秋瑾约蒋氏同去湖南劝捐事必在秋瑾识蒋氏之后，此其二。

据以上两点，我认定秋瑾赴湘潭的时间当在一九〇七年春末光复军成立之后，秋宗章、王时泽之说是。

三、秋瑾与王金发在大通诀别时间考

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，连及大通学校，清军围剿大通前，王金发曾来大通与秋瑾协商善后，并劝秋瑾逃走。瑾为保存浙江数千义军的革命实力，已下定为国牺牲的决心，不许，却催促王金发火速离开。不久，秋瑾即被捕殉难。

王金发这次来大通在何时呢？陶成章《浙案纪略·秋瑾传》云：“（六月）初四日午前九时，王金发自嵊县来，与瑾商酌十日举事之约。午膳毕，从容而去。”他的《浙案纪略》上卷第四章第二节（七）“绍兴之难”所记同此。冯自由《鉴湖女侠秋瑾》、《丁未浙江光复军倡义实录》所记此事，又照抄陶氏之说。因陶、冯二人均与秋瑾有交往，他们所写的《浙案纪略》和《革

命逸史》又有较大的影响，故后人信以为真，秋瑾与王金发在大通诀别为六月初四上午九时之说，遂成定论。解放后几乎所有研究记述秋瑾的专书和文章，都这样以讹传讹。如朱耀庭编《秋瑾》、北京市第五十一中学历史组编《秋瑾》，以及徐双韵《记秋瑾》、谢狱《秋瑾年谱》、周芾棠、谢德铤《秋瑾传略》、王励军《秋瑾与王金发》、徐光仁《论秋瑾》等等，众口一词，均云王金发六月初四（七月十三日）上午九时来大通。据我考查，陶成章的记载是不确的。

查清方档案《绍兴府暨山会两县会禀各宪文》云：“六月初三日，王金发到堂探望，遂即他往。”^⑩又查《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·徐颂扬供》：“初四日有学生来通知，有兵勇来搜学堂。秋瑾就叫堂内嵊县人马发先把洋枪藏好。前一日王金发到过学堂，秋瑾对他说风声不好，催他先逃走了。”这里所谓“前一日”，当指夏历六月初三，此可证清方档案所云有据。遍查六月初四上午在大通、后与秋瑾同时被捕的程毅、徐颂扬、钱应仁、吕植松、王植槐、叛徒蒋继云等人的口供，均只字未提王金发初四上午来大通事；尤值得注意者，是叛徒蒋继云的供词，他亦未供此事。按蒋继云系初四上午来大通（见蒋氏供词），他自然不会了解“前一日”（即六月初三）来大通的王金发；倘蒋继云在初四见过王金发，他必然要供出王氏请赏，因为此时清政府正在通缉捉拿王金发。此其一。

另，《浙案纪略·秋瑾传》和同书上卷第四章第二节“绍兴之难”两处所记，均云王金发初四在大通午膳而去。查《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》中程毅、徐颂扬、王植槐、蒋继云四人供词：又说初四中午秋瑾留蒋继云、王植槐二人午膳；倘王金发初四果在大通与瑾午膳，则程毅、蒋继云等必见，特别是叛徒蒋继云，定供出王金发在大通午膳无疑。今蒋继云等四人供词中均未提及王金发，足见四日中午王金发在大通午膳之说也不可靠，此其二。

据如上考查，我以为陶成章在《浙案纪略》中有关此事的记载有误，而后人不察，以讹传讹，以至于今，应予纠正：王金发最后来大通与秋瑾会面是夏历六月初三（七月十二日）；他在大通停留时间不会太长，清方档案和徐颂扬供词中所称王金发“遂即他往”，秋瑾“催他先逃走了”，当属实；他也并未在大通午膳。

四、秋母逝世时间考

秋母单氏是一位慈母而兼师保，思想比较开明，于秋瑾一生影响颇大。秋母死后，秋瑾曾填词数阙并撰挽联悼念，词意痛切。秋母何时去世呢？于此说法亦有分歧。

吴芝瑛《秋女侠传》云：“（光绪）三十二年秋，女士自东归（按瑾二次归国在光绪三十一年夏历十二月，此处有误），过沪，闻母丧，仓皇归里。”照此看，秋母病故似在一九〇六年秋。徐自华《鉴湖女侠秋君墓表》云：“以母丧，乃暂还越，后乃往来吴越间。”从墓表上下文看，也似在一九〇六年秋。徐双韵《记秋瑾》则明确写道：“（一九〇六年）八月间，秋母逝世，她回绍料理丧事”（谢猷《秋瑾年谱》同此）。以上几处所记时间基本相同：秋母病逝在一九〇六年夏历八月或是年秋。

可是，秋宗章在《关于秋瑾与六月霜》中将其母病逝时间作一九〇六年夏历十二月^①，究竟何者为是呢？

吴芝瑛有《戊申花朝西泠吊鉴湖女侠两首》，诗中“别有伤心人未知”句下注云：“丁未正月，女侠以母丧归里，来吾小万柳堂话别，不知其遂成永诀也。”^②由吴芝瑛这一小注看，秋宗章之说可信。

又，秋宗章系瑾弟，此时已十一岁，对于母丧时间当有记忆。故我认定秋母逝世时间应为一九〇六年夏历十二月。

五、清军围剿大通领队非李益智考

一九〇七年六月初四下午四时，清兵围剿大通学校，秋瑾、程毅等人被捕。此次清军领队是新军第一标第一营管带徐方诏。但解放前后有关秋瑾的传记和史料中，几乎都说是由第一标标统李益智率清军围剿大通，如冯自由《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》的《绍兴光复军》一节、《鉴湖女侠秋瑾》、《丁未浙江光复军倡义实录》、徐双韵《记秋瑾》、朱赞卿《大通师范学堂》、周亚卫《光复会见闻杂忆》、郑云山《秋瑾》、敬莺《女革命家秋瑾年谱简编》等均是。

查《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·绍兴府督同山阴会稽二县印禀》云：“……当蒙许以刻夜派队前来，卑府当即回郡，即于初四日奉宪台派拔常备军步队第一标第一营徐管带率队抵绍，择要分扎。即于是日午后由卑府会同徐管带，督率卑职锺嶽等，带队前诣大通学堂……。”^⑬此徐管带由《陶心云先生为革命先烈秋瑾案驳浙抚致军机处电》稿知为徐方诏，电稿云：“按大通早放暑假，学生留校者，仅二十余人。当时第一标营官徐君方诏请于贵守……”^⑭。秋宗章《大通学堂党案·围搜大通学堂》中亦云：“六月初四下午，贵福会同常备军第一标第一营管带徐方诏督率山阴县知县李锺嶽、会稽县知县李瑞年，带领第一标新军围搜……。”叶颂清《读陈去病〈鉴湖女侠秋瑾传〉书后》：“徐方诏时为防军管带，任（大通学校）剿办。”叶颂清系瑾战友，并亲自参与皖浙起义，所记更属信而有征。

由如上材料证明：带队围剿大通者是徐方诏，而非李益智。此外，《越恨·浙江绍兴府查抄徐锡麟家属株连学界捕戮党人始末记》云：“最可笑者，隔日第一标兵到城外时，绍协守城兵急报府中，连称安徽革命军已到。讯其何知？曰：因来兵皆著旧式学堂体操衣服，令旗大写‘徐’字（按疑徐锡麟之革命军）。后知省

兵管带者，系徐姓故也。”这段讽刺性的文字，是否十分可靠，难以肯定；但由此证明来绍清军领队系一徐姓管带，则是完全可信的。此亦可作为围剿大通清军领队系徐方诏而非李益智的一佐证。

既然围剿大通清军领队是徐方诏，为什么误为李益智呢？究其原因，是在陶成章、冯自由两人。陶成章《浙案纪略》于此所记失之疏略，该书上册第四章第二节（七）《绍兴之难》云：“六月初二日，杭城派第一标兵渡江来绍兴，当兵起身时，将各兵身上及随身各物件皆察搜无遗，恐其有通绍兴党军也”。但陶氏在此并未说明由谁带队来绍。后来冯自由记述这件事时，除一般情节照抄陶说外，意为既然省城派新军第一标来绍，当时第一标标统系李益智，领队当然也就是李益智了。于是冯氏便想当然地在《鉴湖女侠秋瑾》中这样写道：“巡抚张曾敷据报，立派巡防营统领李一（益）智率第一标兵渡江，赴绍兴围捕。”（冯自由《丁未浙江光复军倡议实录》其记述同此）。但后人不察此点，信以为真，遂以讹传讹至今，亟应予辨正。

一九八二年七月于济南

①见毛注青：《黄兴年谱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5页；敬莺：《女革命家秋瑾年谱简编》（载《绍兴师专学报》1981年第3期）。

②见郑云山：《秋瑾》，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44页。

③冯自由：《光复会》、《鉴湖女侠秋瑾》、《丁未浙江光复军倡议实录》中关于秋瑾入会时间的记载，分别见《革命逸史》五集第56页、二集第165页、六集第127页（以上各集均为1981年中华书局重印本）。

④见金冲及、胡绳武：《同盟会与光复会关系考实》。

⑤《浙案记略》，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《辛亥革命》（三）第17、18页。

⑥见《辛亥革命回忆录》（四）第231页。

⑦载《湖南日报》1979年11月11日。

⑧是书1935年3月出版，湘乡铅印局印刷，第201页。上海图书馆藏。

⑨见书第54页。

⑩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《辛亥革命》（三）第86页。

⑪载《人间世》第33期（1935年8月5日出版）。

⑫见浙江省博物馆藏：《兰谱》长卷。

⑬《全案》中尚有《节录绍兴府夹单禀》云：“查当时卑府会徐管带前诣该堂搜查。”

⑭此稿系手抄本，藏浙江图书馆古籍部。

刘世珩与马廉的室名

刘世珩字聚卿，清末安徽贵池县人。同治间举人。家资甚富，性喜藏书刻书，与缪荃孙友善，因精于校勘改证文学，荃孙常勉励其校勘古籍，有惠后学，因而广收宋元旧刊，选辑善本，雕板印行。刘氏尝言：“吾自弱冠以迄今，垂二十稔，无日不与丹黄犁枣为缘”，因此可见其对校刊古籍之辛勤情况，其藏书中有：元刊初印本《玉海》。因名其藏书室为“玉海堂”。

马廉字隅卿，浙江鄞县人。喜藏书，以藏小说戏曲著名。因取得明万历刻二十四回本《平妖传》，为世所罕见，故名其藏书室为“平妖堂”。旧时藏书家重视正经正史，以小说戏曲为不登大雅，故又名其室为“不登大雅文库”。

·雷梦水·